

《纵横》精品书系

民国政要多棱镜

中国文史出版社

《纵横》编辑部 编



K258/7

259913

民国政要多棱镜

《纵横》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政要多棱镜/《纵横》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1

(纵横精品书系)

ISBN 7-5034-1128-7

I. 民… II. 纵… III. 民国 (1912~1948) - 史料
IV.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7513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梨园彩印厂

装 订: 铁成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数: 268 千字

印 数: 3001—45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1 我在溪口见到的蒋介石	宋希濂
9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孟 东
19 阎锡山和他的家族	刘吉人
32 孔祥熙及其子女的劣迹	章长炳
41 从排长到司令的李宗仁	尹承纲
55 一代军阀吴佩孚的没落	黄国平
67 我所知道的陈诚	杜 伟
79 白崇禧逃生记	蓝 鲸
91 陆荣廷其人	汪 骏
106 西北名将鹿钟麟	蓝 叶
129 抗战时期杜月笙在香港	沈立行
139 韩复榘在山东	何理路
154 杜聿明被俘记	杜聿明 陈茂辉

167	陈布雷的最后时刻	胡宏猷
178	“暗杀大王”王亚樵	叶云明
190	怪杰石瑛轶事	刘作忠
203	胡汉民、汪精卫早年的生死之交	祁州
213	反复无常的石友三	黄广源
230	亡命日本的陈公博	孙培云
238	周佛海沉浮录	周之友
290	戴笠摔死真相	赵新
295	马鸿逵逃离大陆	马振宇
301	1949：逃往香港的国民党军队要员	徐毅
310	粤军宿将许崇智	许锡缙
318	胡宗南导演的一场闹剧	裴昌会
321	戴季陶与南京考试院	金声
325	杨森的“新川政”	杜重石

我在溪口见到的蒋介石

宋希濂

1949年3月22日，我和白崇禧同机由汉口飞到南京。大约是在24日上午8时，参谋总长顾祝同约我到他的公馆去。我刚跨进他的会客室，关麟征也跟着到来了。顾祝同对我们两人说：“你们到溪口去见见总裁，我已打电话给空军周总司令（周至柔），要他派飞机送你们去。”（究竟是当时蒋介石有电话给顾祝同叫我们去，还是顾祝同自己的意思要我们去，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我和关麟征于是日正午搭乘一架空军运输机到了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学校已经快搬空了，满地都是遗落的器材和杂物。我们费了不少的功夫才找到了学校的教育长胡伟克，这是个一向性情活泼、谈笑风生的空军上校。这次见面，一点兴奋的情绪都没有。他劈头就说：“你们两位老大哥今天到这里来，既没有东西给你们看，也没有东西给你们吃，真是抱歉万分！学校奉命迁移台湾，已经大部搬完了。1937年秋天我们曾被迫由这里转移到西南去，当时人们虽怀着悲愤的心情离开。但都满怀信心地认为一定会回来的。这一次搬家则完全不同了，大家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谁也不相信会有打回来的一天了。”他叫炊事兵弄

了一些蛋炒饭给我们吃。

约在下午3时，我们换乘一架小型的运输机，不到一小时，就飞抵奉化机场。俞济时来迎接我们，同乘一辆小汽车。行驶约半小时就到了溪口，把我们安排在武岭小学楼上的一间房子里。5时许，蒋经国来邀我们出去散步，我们沿着小溪缓步而行，谈话很少。由于心情沉重，也无意观赏风景。当晚在蒋经国家里吃饭，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些问题，多半是三年来失败的原因，而对前途怎样办，得不出任何的结论。

第二天早晨7时，俞济时说，蒋介石约我们上山去吃早点并谈话。于是我们乘车驶到一片松林前，然后循着两条小石板路走上山去。走了约一千多步便到了蒋介石的住宅。我们在会客室坐下不到5分钟，蒋介石进来了，和我们点首寒暄后，便带我们到屋后去走走，出门后不到两百步，便是蒋介石母亲的坟墓，我和关麟征在墓前行了三鞠躬礼，蒋介石回礼并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后山一带眺望了一番，随即回来吃早饭。饭后，我们分别向蒋汇报了属于自己工作范围内及南京方面的一些重要情况。关麟征还谈到李宗仁征求他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问题，向蒋请示。随后蒋介石向我们两人讲了一大段话，大意如下：

蒋说，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20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像今天这样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功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 and 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如果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筋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

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在抗战期间，许多部队大体尚能保持这种传统的精神而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淫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那时关麟征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蒋接着又说，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你们是我的学生，也是和我共过多年患难的同志，你们万不可轻信旁人对我的诽谤诬蔑，不仅这样，听了这些话，就应该坚决地进行反驳。

上述讲话，是蒋介石这次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他以相当激动的态度和语调，反复地阐述这些意思，足足讲了半个钟头，我也记不得那许多了。

蒋介石随后谈到外交问题，埋怨美国给他的援助还不够，政策摇摆不定，以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大受影响。

最后，蒋介石说：“去年（1948年），我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职务，我是考虑到这样做有很大的伸缩性，我可以以

党的总裁的地位来担负领导的责任，而可避开正面负责的地位，对党国来说，对个人来说，都有好处。可以说，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但党内同志尤以一些老同志坚持反对，一定要我担任总统，结果因副总统的竞选问题，弄得党内意见分歧，离心离德，对外对内，都受到很大影响。现在我摆脱了国家行政元首的地位，今后可以总裁身份就重大政策问题表达意见，反而要好得多。”

记得我当时曾参加那次扩大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他不愿担任总统的意见后就退席了。首先提出反对意见、坚决拥蒋登台的是 CC 派的潘公展、萧净等人。刘公武发言主张接受总裁不任总统的提议，并剖析其利害。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便遭到 CC 派喽罗们气势汹汹的吓骂。戴季陶以元老身份登台发言，他几乎是以教训的口吻斥责主张“总裁不担任总统为宜”这一派人的意见。他力言就党的历史来说，就目前的局势来说，就党对国家的责任来说，都非蒋先生担任总统不可。这样，拥蒋登台派在会上占了绝对优势。最后，通过一项决议，推张群、吴铁城等 5 人向蒋劝驾，结果是蒋欣然接受，袍笏登场了。可见蒋介石当时提出不担任总统的话，只是一种姿态。1949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恼羞成怒，转过来责怪当时劝驾的人。

蒋介石讲完他原来准备要对我们说的一大篇话以后，稍为停息了一下，喝了几口水，接着对关麟征说：“我离南京前，曾和敬之（何应钦）、墨三（顾祝同）谈过，叫你担任陆军总司令，何以尚未发表？李宗仁要你当参谋总长，这是他们企图分化我们的一种阴谋，你不宜担任。你以任陆军总司令为适宜。”蒋介石随即对我说：“如果和谈不成，共军必然渡江，今后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现在湖南境内的几个军，于必要时，应叫他们退到湘西去。如共军向宜昌、沙市进攻，你所指挥的部队，可转移到鄂西一带山地，你的司令部以设在恩施为宜，因为那里有飞机场。陈明仁兵团将来可退到芷江、沅陵一带。这些部队，应归你统一指挥，

以巩固川东门户。此事你回到南京，可和顾总长、林次长研究一下，并把我的意见告诉陈明仁和在湖南的几位军长。”

蒋介石说完后站起来打开会客室的门，叫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卫去找俞济时来。没有几分钟，俞济时就进来了。蒋介石嘱咐他编几本专用密码本交我带去交给在湖南的几位军长，我和关麟征随即向蒋告辞，同俞济时一道下山。约等了半个钟头，俞济时把三本密码本交我带给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第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第一百军军长蒋当翊，并要我对他们说今后可常和总裁直接联系。

上述这些情形，都是蒋介石形式上下野，幕后操纵一切的实际例证。

我们乘一架专机于正午在奉化机场起飞，下午1点多钟到了上海。商得飞行员的同意，决定在上海停留一夜，住在金门酒店。晚间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陈良来看我们。他原在军政部任军需署署长，和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他善饮酒，会讲笑话，任何一次聚会，有他在场，是不会寂寞的。但这次一见面就唉声叹气地说：“完了完了，我们已被共产党打垮，人心已经完全丧失，国民党的气数快要告终了！”

26日上午11时我们回到了南京，一同去见顾祝同，向他汇报到溪口见蒋经过。谈到关于关麟征任陆军总司令问题时，顾祝同说：“这件事，因行政院于2月初即迁往广州，还没有来得及提请通过。不料行政院搬到广州后，孙院长未和国防部商量，就由行政院通过决议，发表了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既已造成了这个局面，目前不便马上变更，只有暂缓一个时候再说。”因此，关麟征之任陆军总司令，延到1949年8月才实现。在当时，陆军总司令一职，并无实权，尚且如此勾心斗角，可见反动派内部的复杂和矛盾重重了。

1949年3月21日7时，李宗仁在总统府设宴欢送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我也被邀参加了。宴会后，李宗仁在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时

仅两小时的重要军事会议。参加者有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张治中、林蔚、萧毅肃（林、萧两人当时都是国防部参谋次长）、汤恩伯（当时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刘士毅（总统府军务局长）、关麟征、宋希濂等共12人。会议讨论了下列3个重要问题：

第一、加强长江防务部署。由萧毅肃报告长江沿岸兵力部署概况后，会议责成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命令各部队严密防范共军南渡，并就海军沿江巡逻、空军分区侦察以及交通补给等问题，作了必要的决定。

第二、将驻新疆部队东调。国防部提出，认为战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新疆驻兵将近10万，在目前情势下，似无必要，建议将驻新部队的大部分东调。李宗仁、何应钦都表示同意，询张治中意见（张那时是西北军政长官）。张巧妙地答复说：“将驻新部队东调，我不反对，但路程遥远，无论步行或车运，均不简单。最好由国防部电召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来京研商后，再作决定。”李宗仁接受张的意见，嘱国防部照办。（其后陶峙岳依据张治中的意旨，一再拒到京、穗开会，形式上接受国防部要驻新部队东调的命令，以要求大量开拨费为借口而拖延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尤以甘肃全省的解放，新疆部队遂于9月间起义投向人民。）

第三、10个美式装备师的分配。1948年蒋介石计划在长江以南地区重新编组150万至200万军队，在各地设立了许多新兵编练司令部。当三大战役的序幕刚揭开时，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多方面拼命作垂死的挣扎。他于是年10月密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局长）赴华盛顿接洽美援。郑介民在美活动了一个多月，得到魏德迈等人的帮助，获得了10个师的美式装备（这是郑介民于12月从美国回来后当面告诉我的）。这些装备，于二三月间陆续运到了上海及台湾等地。这次会议上，白崇禧提出要求分配给他4个师的装备，说他在广西有几个新

兵训练处，在武汉有两个新兵训练处，兵员已大部征足，急待配备武器，进行训练。顾祝同则谓现时全国设立的新兵训练处甚多，大家都要求颁发武器，此事必须由国防部按照实际情况，统筹配发。白崇禧借此大发牢骚，说：“过去许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队不发，不能打仗的部队倒发了，结果都送给了共产党。现在局面弄到这个地步，你还想操纵把持吗？”（白这番话是对顾祝同说的，实际是指蒋介石、何应钦等。）顾祝同也不甘示弱，立刻进行反驳。一个坚持要4个师的装备，一个坚持不肯，相互间顶起嘴来，声音越说越大，意气愈来愈盛，弄得脸红脖子粗，大有互相辱骂甚至动武之势。何应钦看见情形不对，连忙劝他们两人不要争吵，说此事待他仔细研究一下，再请示李代总统决定。一场激烈的争吵，算是平息了。以后听说分给了桂系两个师的美械装备。

最后，李宗仁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散会了。从这个为时仅两小时的会议里，可以看出一些人高唱和平的假面具以及反动派内部互相撕咬的丑态。

我于和谈代表团飞北平后的第二天离开南京。这次在南京共住了11天。在这11天中，凡所接触过的人，除张治中对和谈还抱有几分希望和信心之外，其余都是一片悲惨的绝望哀鸣。20年来为蒋介石所最亲信的参谋次长林蔚，向来是一个说话十分慎重的人，有一天我在他的办公室和他谈到前途未卜时，他摇头叹息地说：“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是20多年积蓄起来的精华，现在几乎被共产党完全歼灭了，局势败坏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就是叫我们投降，有什么和谈可言？我自当幕僚以来，很少携带手枪，现在我把手枪随时佩带在身，准备万一被共军抓住，我就自己了结自己。”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大革命北伐时期，我就和他在一个团共事，又是常在一起下棋的棋友，这次一见面就说：“老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那样好的一个局面，想不到只有3年功夫，就会失败到这个地步，真是像做

梦一样。”他站在空军总部的台阶上指着小营附近的一片新房子说：“这些都是空军几年来盖起来的，有的尚未完工，现在得让共产党来住了！”言下不胜唏嘘感慨。

南京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称为新住宅区，数以千计的小洋楼形式各异，争奇斗妍，美仑美奂，除一部分属于外国使馆以外，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政府的达官要人们的住宅，而这时已是十室九空了。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区，在这一带的许多大旅馆、上等餐馆、酒楼、茶楼，过去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是顾客稀少，门庭冷落。一到傍晚，许多商店已歇业，街上行人屈指可数。我看了这一片凄凉的情景，自然而然地念起元代诗人萨都拉“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那首词来。我想，现在该是第七代了！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孟 东

蒋经国留学苏联被软禁后经多方协调辗转回国已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则少为人知。个中的原因连蒋介石自己也讳莫如深，不愿为外人道，就连他亲定的传记作者毛志诚也只是匆促地数笔带过，加上苏联方面的材料没有解密，人们对蒋介石的这一段经历自然所知甚少。直到1956年，由蒋介石亲撰的《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二十年经历纪要》在台湾出版，这一段史实才略有披露，但涉及他苏联之行的文字极为缺少，他在书中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如果遵照苏联的政策，那么“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其间而已。”也许，蒋介石真的忘了他此去负有极为重要的秘密使命，那就是说服苏联政府帮助孙中山实现“西北军事计划”，发动打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南北夹击行动，为进而统一全中国奠定基础。为了赢得苏联的帮助，蒋介石在莫斯科的言行极具“左派”色彩，而后来的蒋介石则走向了反面，这正是蒋介石不愿提及此事的真正原因。

莫斯科之行的缘起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秘密率领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到苏联考察党政军组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西北军事计划”的策划者是孙中山和俄共（布）的一些地方领导人，最早动议可以追溯到1920年9月孙中山与苏共驻上海代表刘江（俄文名字为费奥多罗夫）的一次会谈，当时孙中山在广东联合陈炯明进行革命，很想与中国北方的大国苏联取得联系。会谈中，孙刘二人对将中国南方的革命力量同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的想法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刘江还于10月5日把会谈情况汇报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员会，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了下文。到了1922年，陈炯明背叛革命，6月16日凌晨炮轰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蒙难之时，蒋介石奉召，不顾自身安危指挥永丰舰英勇作战，深得孙中山的信任。此前，蒋介石拟撰的《对北军作战计划》、《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等文件已令孙中山对其颇有好感，这为孙中山日后选定蒋介石秘访苏联埋下了伏笔。从广东避居上海的孙中山，此时不得不考虑另寻他途，联合苏联的计划再一次涌上心头。9月，孙中山和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会见苏联军事代表赫克尔将军，表达了依靠苏联援助、在中国西北（新疆或者外蒙）建立革命武装的想法。赫克尔把孙中山的这一设想转告苏联驻华大使越飞，越飞表示非常支持，并慨然允诺给予军火和财力援助。1923年5月1日，越飞从东京转给孙中山一份来自苏联政府的绝密电报，其中有三点主要内容：第一，苏联政府同意并决定提供200万金卢布资助孙中山，用于中国的统一和民族独立行动；第二，苏联政府拟定帮助孙中山在中国北部或者西部省份组建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单位，并愿意提供所需的军事物资、军事顾问和教练；第三，希望孙中山“严守秘密”。

为什么要孙中山严守秘密呢？一是因为苏联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想授人以柄；二是苏联和中国国内的其他势力也有联系，在形势不明朗之前，他们不想暴露同孙中山的关系。5月15日，孙中山给苏联外交部和越飞发出了一封绝密电报，电文中称：苏联政府的决定“给我们很大希望”，“我们将竭尽全力去实现这些建议”并“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以便讨论细节。”当时，孙中山一方面迫于国内的复杂局面，另一方面出于保密以及安全的考虑均不可能亲往苏联。他心中选定的代表就是蒋介石。1923年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时，蒋介石就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已是地位显赫的实权人物。

蒋介石对孙中山派他去苏联的决定，自然是诚心服从。7月下旬，蒋介石就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筹备工作。他多次与孙中山、汪精卫、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商讨代表团的组成和考察计划的细节及内容，还与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马林会面，征询意见，了解情况，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蒋介石对此次苏联之行有着很高的期望，他觉得此行不仅对国家有利“以期根本解决此国事耳”，而且对他自己的前途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欣悦之情溢于言表：“为个人计，则甚得也。”（见蒋写于1923年7月23日的日记）

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孙中山决定将代表团命名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蒋介石任团长，其他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张太雷（中共党员）。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秘密登上北去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9月2日抵达莫斯科，路途花费半个多月，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在莫斯科的活动

到达莫斯科，他们被主人安排在克鲁泡特金街口的一所宾馆中，此宾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安顿下来以后，他们先打扫个人卫生好好睡了

一觉，然后就开始必要的准备工作。

9月6日，他们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出面与他们会谈的是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首先就一般性的问题互相交谈，实际上为了表示尊重，主要是听鲁祖塔克介绍苏共的情况。两个多小时以后，话题总算转移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西北军事计划”上来。讨论中虽然谈到如何落实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下去，更谈不到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9月9日下午3点（莫斯科时间），蒋介石一行如约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拜会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后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就“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及具体内容做了详细的说明。根据俄方已解密的档案记载，关于这次会谈的《书面报告》中，苏方把“西北军事计划”明确地归纳为两点：一是“在新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二是“按照我们（即苏联）的方式组建中国军队”。此次会谈于7点钟结束，可谓马拉松式的。临分手时，苏方的两位将军微笑着向蒋介石建议：可否以“书面的形式进一步阐明这项计划”。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蒋介石除了必要的集体行动以外，一直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拟定提纲、改正修饰、校阅修定等，因为孙中山的“西北构想”只有一个大致轮廓，具体方案必须由蒋介石拟议完成。为保证这份书面报告能得到苏方的支持，取得预想的结果，蒋介石的工作相当投入。

10月12日，书面报告终告完成。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建立军事基地。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边境地区选择适当的地点，建成军事基地，以期作为不远的将来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第二，军事基地的选择。希望苏联考虑以库伦（即蒙古共和国现首都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果两者取一，提请苏方考